

《经济学家茶座》精品栏目系列

经济学人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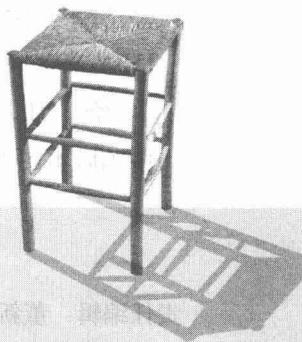
王建国 W 杨小凯 张友仁 W 蒋硕杰 熊秉元 W 张五常
易宪容 W 张五常 张晓晶 W 樊 纲 柳 红 W 吴敬琏
汪丁丁 W 贝克尔 杨春学 W 凯恩斯 王玉霞 W 黄有光
史晋川 W 科 斯 陈 抗 W 奥尔森 纪 辛 W 方显廷
余永定 W 浦 山 赵人伟 W 骆耕漠 陈瑞铭 W 顾 准
聂辉华 W 杨小凯 黄范章 W 陈岱荪 王玉霞 W 张五常
李俊慧 W 邹至庄 王玉霞 W 张培刚 董全瑞 W 杨瑞龙

读《经济学人》，听经济学界评论海内外著名华人经济学者的学术、人生和趣事。

山东人民出版社

经济学人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读《经济学人》
听经济学界评论海内外著名
华人经济学者的学术、人生和趣事。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人/金明善主编.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12

(《经济学家茶座》精品栏目系列)

ISBN 978-7-209-04670-1

I. 经… II. 金… III. 经济学家-生平事迹-世界 IV. K81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1716 号

责任编辑 董新兴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设计 刘冉冉

经济学人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电话: (0531)82098027 82098028 8209802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装

规 格 16 开(172mm×232mm)

印 张 2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4670-1

定 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39)2925659

目 录

- 王建国 我的老师杨小凯和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001
- 张友仁 周炳琳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的友谊 /003
- 熊秉元 是非张五常 /008
- 易宪容 张五常其人其事 /011
- 梁小民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一) /016
- 梁小民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二) /024
- 张晓晶 樊纲:经济学界的“刺猬” /032
- 柳 红 如果你是大海,舀出来一勺,还是大海
——记吴敬琏论学 /038
- 汪丁丁 永远的贝克尔 /043
- 韦 森 沾亲带故: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 /049
- 杨春学 作为投机家的凯恩斯 /053
- 王玉霞 黄有光教授的笑声 /056
- 史晋川 聆听大师的教诲
——科斯教授午餐谈话侧记 /059
- 李俊慧 科斯的情怀
——爱上从未谋面的中国 /064
- 柳 红 《改革》杂志的两位主编 /069
- 李伯重 批评何必成冤家
——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之间的争论和友谊 /075
- 梁 捷 熊彼特与凯恩斯 /078



- 陈 抗 三个和尚一定没水喝吗?
——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一) /081
- 陈 抗 瓷器店里的哄抢
——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二) /086
- 陈 抗 流寇,坐寇,看不见的左手
——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三) /090
- 陈 抗 外国有个加拿大,外国也有大家拿
——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四) /094
- 徐康宁 两个人与一个国家 /099
- 李 斯 “北京赣籍经济学人”群体扫描 /105
- 熊乘元 智者克鲁慢,识者张五常 /111
- 董新兴 一个经济学家的真话
——访梁小民教授 /114
- 董新兴 直言是金
——访王松奇教授 /127
- 董新兴 制度与产权理论的解释力
——访黄少安教授 /137
- 柳 红 行云流水
——朱玲访谈 /142
- 徐庆全 我的外公孙冶方
——武克钢访谈录 /149
- 纪 辛 中国经济学界的曾经领军人物——方显廷 /166
- 赵 峰 欧文·费雪的传奇 /172
- 余永定 怀念敬爱的浦山先生 /175
- 赵人伟 骆耕漠的“三个过渡”是唱对台戏吗? /179



- 张友仁 蒋硕杰教授的经济学人生 /184
- 王梦奎 北大经济系旧事 /190
- 汤铎铎 叔本华的豪猪和哈耶克的知识 /194
- 陈瑞铭 追思顾准 /199
- 新 望 改革年代里的兄弟经济学家
——近看孙冶方与薛暮桥 /208
- 许成钢 自学与思考 /212
- 聂辉华 一个大陆学生心中的杨小凯 /220
- 刘佛丁** 王玉茹 南开经济学科的奠基人何廉、方显廷 /224
- 韦 森 亚当·斯密：一个鲜为人知的语言学家 /231
- 黄范章 陈岱孙老师的哈佛情结
——纪念岱老逝世十周年 /236
- 王玉霞 神化与魔化了的张五常 /239
- 张问敏 忆“文革”时期孤凄的顾准 /242
- 沈 越 小韦伯与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245
- 王玉霞 我的经济学人缘 /250
- 沈 懿 张维迎：中国经济学界的“大白话家” /257
- 方 文 疏离的眷恋
——相识熊秉元先生 /263
- 何 帆 谁还在拯救自我 /268
- 李俊慧 邹至庄：经济学界的普罗米修斯 /273
- 韦 森 纳什与科斯 /279
- 王则柯 冯·诺意曼为小人物丹齐克辩护 /282
- 王玉霞 穿过夜幕的经济学明星
——张培刚教授 90 华诞见闻 /286



- 聂辉华 杨小凯:华人经济界的“骄杨” /290
- 柳 红 滴水见日
——访问梁小民 /296
- 刘汉民 O.E.威廉姆森的学术历程 /303
- 赵人伟 大师已去 风范犹存 /307
- 陈瑞铭 我心目中的“耕漠同志” /311
- 顾秀林 我心目中和记忆中的骆耕漠伯伯 /316
- 王梦奎 苏星和他的《新中国经济史》 /319
- 董全瑞 我观杨瑞龙教授讲经济学 /323
- 卢昌崇 经济学人路深浅,叩问国计为民生
——我“师父”汪祥春教授 /326
- 叶 坦 景行化雨 史通古今
——追思赵靖先生 /335
- 陆兴龙 从史料中追寻历史
——记张仲礼先生的学术研究 /342
- 赖德胜 学问靠真 /347
- 李辉文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纪念高鸿业先生 /352
- 谭国富 林少宫老师与经济学研究生培养 /357
- 赵德馨 高山仰止——记吴承明教授二三事 /360
- 赵人伟 薛暮桥一个未圆的梦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兴建之流产 /365
- 李 钧 和岳父薛暮桥一起生活的日子 /370
- 冒天启 在冶方身边重读《资本论》 /376
- 朱绍文 早期两岸经济学家的交流
——陈岱孙先生与蒋硕杰先生的几封信 /384
- 陈 抗 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 /388



我的老师杨小凯和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王建国*

杨小凯的英年早逝,震惊了整个经济学界。无数经济学人因失去这位经济学大师而深深痛惜。作为小凯的学生和朋友,我好像突然失去了智慧的依靠。“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深感悲伤。

有三位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做过我的导师,他们是张五常、黄有光 and 杨小凯。他们对我的思想、知识和人生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莫纳什大学(Monash)求学时,杨小凯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他是我的长沙老乡,我十一二岁时,就常在长沙的大街上见到杨曦光的大名和读到他的大文《中国向何处去?》。我在武汉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在那里当老师。可见世间之奇之巧,一个“缘”字而已。

湖南历史上出尽英雄豪杰,无奇不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唯独没有知名经济学家。小凯为我们湖南填补了这块空白。

我在海外求学,工作和教书20年有余。见过不少学者和人物,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在经济学方面,小凯是真正的翘楚和佼佼者。他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思想家和怪才。他写得一手好文章,连写小说也不让行家里手。他的小说《狱中精灵》深刻描写了他十多年的牢狱生活。而小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早已家喻户晓,人尽皆知。

当代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势已成主流,再好的经济思想,若不能数理化,就很难登大雅之堂。而我们常常遇到两类经济学家。一类是充满了创意、天才与思想,但缺乏使其数理化的技巧,难以把思想转化为正规的经济模型。因而只能停留在描述的阶段,难以纵深探讨下去。另一类是精通经济学、数理化的技巧,但缺乏原生的经济思想与创意。若要成大家,非两者兼备不可。小凯深具这两大条件。他精通数学,不乏原生经济思想与创意。

他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原生的经济思想结合已有的经济学成就,用现代的经济数理重构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体系。在方法论上,他突破了边际分析方法,自创了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和效用比较方法。在研究对象上,他认为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资源分配的优化,更要研究劳动分工、经济组织、交易效率对生产力和福

*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利的效果。在结构上,他抛弃了新古典从马歇尔开始把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分离的模式,代之以经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模式。这样,从他的模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组织的演进是由个人决策内生而来。这样,产品种类的增长,公司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城市化的产生等等,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他的经济理论里,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第一次成为多余的东西。无疑,小凯是数理经济思想的高手,不仅数理化自己的经济思想,也数理化别人的经济思想。例如他成功地把张五常教授的交易费用和公司理论数理化为正规的模型。他数度同我说,张教授在经济思想的深度上早已超越高斯(Coase)。

我在小凯那里学到的,主要不是一把度量世界的尺子或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是一种制造一把好尺子的方法。对他说来,用什么尺子去度量世界远不如制造尺子的方法重要。可以说,我的经济学的数理建模技巧主要是学自于小凯。例如,我把我的相对效用思想与他的劳动分工理论结合,建立了一个漂亮的数理模型,成功地描述了人们追求相对效用对劳动分工水平的影响。

在莫纳什大学时,我们有一个聚餐沙龙,每周一次。一边吃喝,一边讲座。在经济学之外,我们也讨论各种其他问题,如哲学、诗词、方法论、时事世局、文学和音乐等。在这些讨论中,我也从小凯那里获益匪浅。

小凯一生,历尽坎坷,成就大业,无杨小凯便无新论,有经济史必有斯人。
斯人已逝,安息天国,风范人间,每忆老师历历在目,不忍笔墨永远缅怀。



周炳琳教授和 冯友兰教授的友谊

张友仁*

周炳琳(1892~1963),浙江黄岩人,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人。

周炳琳教授和冯友兰教授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同学,又是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同学。回国后又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共事达数十年之久。

周炳琳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1920年夏天毕业。在校期间,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文章,参加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中打入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被选为北大评议会临时评议长、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务委员等职。冯友兰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8年毕业,没有赶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20年周炳琳经蔡元培校长选拔,取得穆藕初奖学金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冯友兰1919年考取河南省的官费,也到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对于周炳琳到美国留学的情况,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有如下描述:

在我去美国的时候,北京大学的“五大臣”也到美国了。有一个中国资本家名叫穆藕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办纺织业发了大财,他捐了一笔款给北大,叫送五个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出国留学,所给的费用,比一般官费学生都多。我们那时候的官费是每人每月九十美元,穆藕初给的费用是每人每月一百二十美元。北大选出了五个人: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当时称为北大“五大臣出洋”。清朝末年曾经派五位大员出国考察宪政,时称“五大臣出洋”,现在是戏用这个典故。还有一个孟寿椿,本来也可以去,但是因为名额限制,不能去。这五个人都自愿每月只要一百美元,把多余的钱凑起来增加一个名额,叫孟寿椿也去了,实际上是“六大臣”。在这六个人中,段锡朋和周炳琳都在纽约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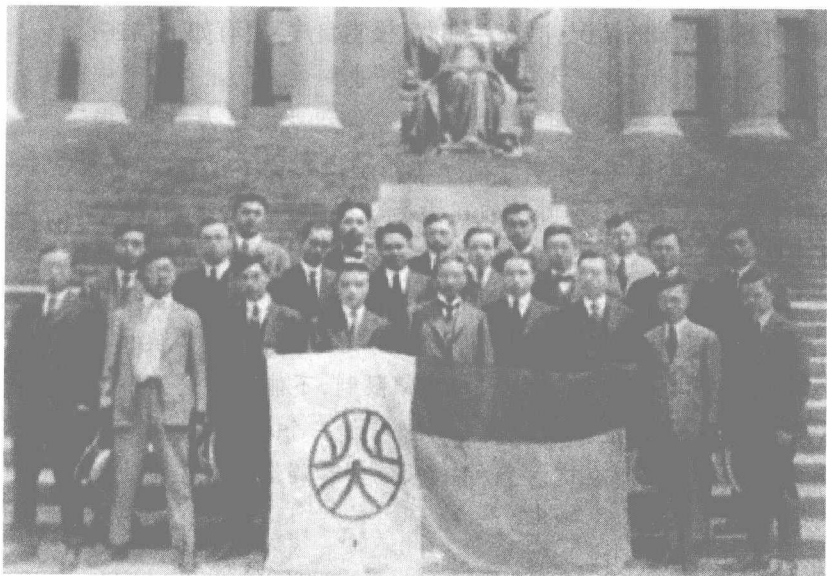
*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罗家伦上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两下距离不远，罗家伦一有空就到纽约来。我们这些北京大学毕业的和其他经过五四运动的人，同当时别的中国留学生显然有些不同。不同的是，对于中国的东西知道得比较多一点，对于中国政治和世界局势比较关心。

1921年蔡元培校长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事业。6月1日到纽约，周炳琳、冯友兰、赵迺抟等北大同学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他们到纽约的轮船码头上迎接到蔡元培先生，将他接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座旅馆住下，大家轮流陪着他到各地去参观。

6月3日蔡先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北大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讲话，他说：“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交了一个朋友，会点石成金。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用手指头一点，那块石头就变成金子了。那个朋友对那个人说：‘你要多少金子，我都可以点给你。’那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那个手指头。’”“你们在这里留学，首先要学的是那个手指头。”他还与北大同学一起在哥仑亚大学主楼前合影。这张照片现在收藏在国家历史博物馆中。同学们在照片的边框中写道：“子师惠存”、“旅美北大同学会欢迎纪念”、“十年六月三日摄于纽约”。照片上还写着每一位北大同学的姓名。在蔡先生右边第一人手持北京大学校旗的是周炳琳，第二排左起第一人为冯友兰。



旅美北大同学
欢迎蔡元培校
长访美，于纽
约哥伦比亚大
学主楼前合影



1928年冯友兰应罗家伦校长之聘到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1929年周炳琳也应罗家伦之聘到清华大学任经济学系教授。他们都住在清华园乙所,做了邻居。

1930年罗家伦辞去清华大学校长职务,离开清华,校务由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维持,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1930年7月冯友兰感到校务难以维持。后来,他在《三松堂自序》写道:

我就向南京教育部打电报,说学校秩序不能维持,请催罗校长返校,或是另派新校长。经过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以部令派周炳琳代理校务。周炳琳不干。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一个大学的校长,最好是本校的毕业生担任。如果是由别的大学毕业的人担任,那就等于把这个大学作为那个大学的殖民地了,有亡校之痛。周炳琳对我说:‘现在清华人对于北大人就是这样想法,罗家伦走了,又有一个北大人接,恐怕不好。’周炳琳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又过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派人对我说:‘周炳琳不接,那就由你接吧,不过还是代理校务的名义,以部令发表。’我想周炳琳想说的那种情况是有的,他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我更不能接了。我也向南京教育部辞谢了。

后来,周炳琳1931年秋起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冯友兰仍在清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

1933年夏,冯友兰趁清华休假一年的机会到欧洲考察,遍历意、英、法、德、瑞士、捷克、苏联等国。1934年回国后在北平作报告时客观地讲了几句关于苏联的见闻,认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不料竟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北平警察总监当做共产主义分子而逮捕,并从北平押送到蒋委员长保定行营和河北省政府所在地保定。这时周炳琳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法学院院长,还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并兼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冯夫人任载坤女士到北平史家胡同56号周宅找周炳琳求救。任载坤的二姐任纬坤的丈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时牺牲的革命烈士孙炳文。任载坤很害怕这次冯友兰也成了革命烈士,她急迫中竟向周先生下跪磕头,被周先生和魏璧夫人赶快拉起。周先生对冯先生加以积极营救,第二天冯先生就被释放出来送回北平。冯先生后来在《贞元六书》中的一书中讲到此事,并说:有事则长,无事则短。我在狱中虽然只有一、二日,出来以后却有度日如年之感!

1935年,敌伪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周炳琳和傅斯年共同起草了《国立平津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宣言》和《平津国立院校全体教职员通电》,坚决

反对此种运动。文中写道：“中华民族为我四万万共同血统、共同历史、共同语言文化之同胞所组成，绝对不容分裂，大义所在，责无旁贷，吾人当尽全力向中央及地方当局请求立即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国闻周报》第12卷第48期，1935年12月）冯友兰对此宣言和通电极力赞同，并且签名发出。

1945年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前已圈定周炳琳、冯友兰为中央委员。周炳琳拒绝出席这次大会，也拒绝担任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冯友兰则在晚宴中向蒋介石说：“我要当选你的中委，再对青年们讲话就不方便了。”婉言谢绝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1945年西南联大一二·一运动期间，梅贻琦主席远在北京，他委托周炳琳担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主持校务。当时冯友兰为文学院院长。在此期间，周炳琳起草和签发了许多急电和抗议书。12月19日西南联大教授会推举周炳琳牵头，与冯友兰、赵迺抃一起草拟《西南联大教授会告同学书》，书中写道：教授会同要求政府对此事件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教授们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这次教授会还推举周炳琳、冯友兰、赵迺抃代表教授会往见云南省主席卢汉、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要求严惩凶手及主使人，以及要求取消禁止自由开会之前令。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迁回平津。西南联大设置图书迁运委员会，聘请周炳琳、冯友兰、叶企孙、施嘉炀、潘光旦、董明道为委员，周炳琳为召集人。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教授在昆明被特务杀害。周炳琳在重庆闻讯，极为愤怒。他当即致函梅贻琦校长称：“此案应追个明白，谁实指使，必令负杀人之责任。”周炳琳又与复员途经重庆的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等于7月18日联名致电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要求政府从速惩凶。其中写道：“闻先生治中国文学成绩卓著，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祈主管当局务缉凶归案，严究主使。政府在道德上，法律上之责任决不能有所规避。对于其所属人员，亦自不能有所曲护，并祈从速处理，以平公愤，无任企祷！”[《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7月28日]

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周炳琳极为愤慨，他执笔写出《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抗议书，共征得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的教授共48人联名在《观察》杂志第3卷第11期（1947年11月8日）上发表。指出政府压迫民盟之举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一不合作，遂谓之‘叛’，



稍有批评,遽谓之‘乱’,又且从而‘戡’之。试问人民的权利何在?人民的自由何在?”“对一个持异见的在野政团如民盟者横施压迫,强加摧残,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举动。”因此,“义之所在,不容殫然。”要求政府,“对于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一事,应当重作决定。”这份抗议书,清华大学教授们的签名是请吴晗教授在清华园挨家访问取得的,有金岳霖、朱自清、陈达、戴世光、钱伟长、李广田、许维儒等。本来也应请冯友兰的,只是因为那时他不在清华而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而没有他的签名。

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周炳琳和冯友兰都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派来的专机,留在北平,迎接解放。1949年北京解放后,毛主席在10月13日给冯友兰的信中写道:“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对于周炳琳,毛主席1952年4月21日在给彭真的信中写道:“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

1952年秋,我国高等学校经过院系调整,成立新的北京大学。周炳琳仍在北京大学任经济学系教授,冯友兰则随清华大学文学院调整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他们又都在北京大学任教,直到他们因病辞世。

周先生1963年病故后,冯先生写了几首律诗悼念周先生,诗中对周炳琳的一生做了客观的概括和高度的评价。后来在北京嘉兴寺举行的周先生的追悼会上,他将它们用大字写成条幅,挂在壁上。可惜追悼会后,工作人员将冯先生的诗歌条幅和其他挽联等一起按照惯例作为祭品给烧掉了。我曾就此事向魏璧女士说起,冯先生的诗歌非常重要,不该烧的,烧掉了太可惜。魏璧说:“那么,我去燕南园请冯先生重新写出!”可是,直到她在“文革”中逝世,并没有去请冯先生重写。

1990年冯友兰先生逝世后,陆续出版有《冯友兰全集》。经过查找该全集,却没有找到冯友兰悼周炳琳的这几首诗。后来,又出版了一本《冯友兰全集补遗》,又经查找,也没有这几首诗。我曾经请冯先生的次女冯宗璞女士在家中冯先生遗稿中寻找,可是遗稿太多,至今尚未找到。

现在,冯宗璞女士正在编写新版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她已经将冯友兰先生写诗悼念周炳琳先生一事记入年谱手稿中了。

是非张五常

熊秉元*

1999年4月22日,我在《信报》发表文章,描述“科斯定理”由理念到成为政策,花了67年。5月13日,《信报》刊出张五常的投书,编辑加的标题是“张五常教授指正《光阴的故事》”。张五常表示:“我细读该文,发觉有好些要改进的地方。”我的文章只有1200字,他指出5点缺失。

2001年5月31日,张五常在《壹周刊》的专栏“南窗集”里,指名黄有光和我,说我们两人是“读错了剑谱、练坏了武功”。2003年4月3日,在同一专栏,文章的题目是《与其临渊羡鱼——语熊秉元教授》。他表示:“从熊教授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心脏是在正确的位置(his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他的观察力很有两手。但为什么要羡慕我的经济研究?……只不过是,带球进攻,过关斩将,埋门之际,我懂得起脚扣射。”

2003年12月23日,他在专栏“还敛集”里提到,熊秉元在《信报》比较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海伯纳(Robert Heilbroner)的文章,读了之后,觉得“秉元老弟对熊、海二师的欣赏不少人有同感,但我却看不到皇帝的新衣”。2003年7月,他描述经济散文的来龙去脉,说道:“近年来经济散文盛行,澳洲有个黄有光,台湾有个熊秉元,在香港则要数区区在下了!”

不论张五常对我的指点如何,到现在我们还没碰过面或谈过话。我很难揣测,如果有机会浅交或深交,自己的感受会是如何。不过,我知道别人的感受是如何。而且,这位仁兄来头不小,笔下所描述的绝对算是经济学界的掌故或花絮。

1990年,经济史学者诺思(Douglass North)出版《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是他集大成之作;三年之后,他得到诺贝尔奖。在第四章一开始(第27页),他提到,关于财产权理论,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发展出独树一帜的理论,主要的经济学者包括张五常、巴赛尔(Y. Barzel)和诺思本人等。

* 作者系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



两页之后,他解释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举的例子生动有趣:“就我自己而言,身为经济系主任,在聘请助理教授时,掌握的信息有限:我不知道他们教书能力如何,和同事相处如何,会不会用系里的电话,打电话给自己在香港的朋友?(would ‘call friends in Hong Kong at departmental expense’)”

先提到张五常的大名,紧接着再以香港为例,臧否假公济私的行径。这不是巧合,诺思显然有不少苦水。一位经济学界的朋友说,在某个私人场合里,诺思曾明确证实:他指的就是张五常!然而,另外一位经济学者,却有不同的说法:当年在华盛顿大学,张五常的研究经费最多;以研究经费支付长途电话,合于情理。而且,他发表的论文里,包括探讨香港的房屋问题,打电话到香港搜集资料,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老外听不懂广东话,疑神疑鬼。显然,信息不完整,理未易明。

不过,如果好事之徒问诺思:《制度》出版三年之后,阁下戴上诺贝尔奖桂冠,这本书立刻洛阳纸贵,书中对张五常的影射,变成天下皆知。那么,如果早知道如此,会不会还是同样写法?无论诺思的答案如何,嘴上讲的和心里想的是否一样呢?显然,又是信息不对称,理未易明。

那么,张五常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别的不说,张五常当然是一位很特殊的人:他是知名的经济学者,曾经得过加拿大乒乓赛冠军,开过摄影展,自己规划设计的餐馆大发利市,笔下的“经济散文”读者无数。不只如此,他的特殊还反映在别人对他的评价上——不是毁誉参半,而是毁誉两极!

城邦出版集团的总裁詹宏志,曾用“惊为天人”来形容张五常的文章。张五常在中国内地的演讲,听众动辄两三千人;所到之处,欢声雷动,有如偶像明星一般。还有一群拥护者,诚心诚意地为他争取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际遇,不仅华人经济学家家里绝无仅有,在中外学术界里,恐怕都屈指可数。

相反的,在言词和笔墨之间,对张五常调侃、嘲讽、戏谑、贬抑的,所在多有,我自己就听过和看过不少。《狂生傲语张五常》,是中国内地出版的一本书,书中的许多遣词用字,绝对不是温良恭俭让。他和长期任教的香港大学对簿公堂,大概无益于他的人缘。美国财税单位先指控他逃漏税,继而发出通缉。幸灾乐祸的人,可能不在少数。那么,对于这位毁誉两极的特殊人物,到底该怎么评估呢?也许,最好的方式是“浅中求”——世事太过复杂,理未易明,唯有依赖简单的概念,庶几近之。对于一般市井小民,特征简单明确,因此,贩、夫、走、卒四个字,已经足以概括四大种类。然而,特殊人物如张五常者,才华横溢,不择地皆可出;恃才傲物,自矜自是;目中无他人,只有自己这朵水仙花。张五常的为人处世,有好多个面向,彼此争奇斗艳,各擅胜场。要面



面俱到,对他作个四平八稳的总评,显然很难。因此,为了降低认知和思维的成本,两极化大有好处。无论毁誉,都有助于自处;真相如何,反而并不重要,这是典型的“错比空好”:一片空白,令人惶惑不定;涂上色彩,无论黑白,立刻有了参考坐标。

抽象来看,“浅中求”和“错比空好”,其实都是需求定律(Law of Demand)的反映——由浅显处着手比较容易(价格低),可以多做一些;空白的状态不佳(成本太高),少取一些。一般人对张五常的评价趋于两极,其实可以从经济学的精髓得到解释。那么,张五常对自己的评价,又是如何呢?

张五常文章里多次提到,他的为学处世和人生挥洒,都是基于两个字——过瘾!那么,关于“过瘾”,是不是也有适当的“经济解释”呢?……